

□ 特稿 42

2013即将成为历史。无论好与坏,这一年的道德事件都将过去。然而,关于道德的迷思并未一一解开——
审丑心态背后的道德焦虑如何化解?
社会道德瑕疵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根由?
下探的道德底线最终靠什么重新树立坐标?
道德构建的先驱又要依赖什么路径与人群?

道德中国:留给2013的觉悟与迷思

——对话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本报记者 李瑾

前言

像以往一样,每到年终我们都会回顾总结这一年的社会道德领域的热点事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我们让新闻事件的盘点作为引子,更多的空间让位于透过现象洞察背后历史、文化、发展的深层解析,站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解读当下热点,为诸多迷思寻找答案,才可能最终建立起明天的道德坐标。

[人物档案]
公方彬,党的十八大宣讲团成员,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中国社会道德20余年,著述系列丛书《觉悟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决策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信仰共产主义。

普遍的道德焦虑

百姓不敢扶老人与名人找大师

11月,四川达州市民江先生向媒体喊冤,声称自家孩子明明做了好事,看见一太婆上去搀扶,反倒被太婆诬赖说是被撞倒,索要赔偿医药费。媒体报道后,太婆也来喊冤。一出事关老人道德的罗生门讨论成为舆论热点。

8月,马云自曝与大师王林的合影,进而引发外界对这位低调神秘大师的“人肉搜索”。号称可以“隔空取蛇”的王林,被逐一扒出与多位文娱明星的合影,甚至一些官员都与大师有过交往。

一边是老百姓为要不要搀扶路边老太内心纠结,一边是众多名人为了暗藏的欲望痴迷于求神拜佛,这种几近群体化的躁动不安,显示出内心的焦虑普遍蔓延。

记者:从是否“被撞”到广场舞地盘之争,“大妈问题”在2013年话题不断。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为什么日益受到强烈的挑战?

公方彬: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发生了多起老人讹诈的事件。但是,哪怕还有更多老人道德失范的个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这就如同尽管罪案比例更高,我们依然不能以个案、群案来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于道德价值体系出现紊乱,人们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体系、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内心的虚无造成行为上的反道德,内心的焦虑需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伦理道德的范式中,一直把老人当成道德的标识和引领者。一旦这一群体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很容易让人们以审丑的心态去炒作放大,并以此作为社会堕落的佐证。

与此同时,审丑的心态已经开始成为这个时代大众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里面呈现的价值观甚至让美国学者都感到难以置信,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连有关郭敬明早年抄袭的异议也被彻底淹没,反而被有的自诩“前卫”的媒体追捧为新一代商业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会都热衷于迎合和满足这种审丑欲望时,原本存在的欺诈和丑恶遭到几何倍数的放大,社会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性中还有美的存在吗?

记者:相对于普通人的这种道德焦虑,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师”的持续发酵,让我们看到像马云、赵薇这样的成功者,似乎同样在热衷寻找“神秘力量”。在所谓的上流圈子里,这种心态和举止已经成为很流行的现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实并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区别。能否找到精神归宿,不决定于社会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养,这是一个无限的运动,有始无终。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权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会发生蜕变。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一些成功人物热衷追寻某种“神秘力量”,恰恰说明社会主流或主导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层面看问题,我们党同样也面临着信仰危机的挑战。过去,革命阶段有牺牲,而牺牲带来神圣感,进而形成和强化信仰。当下,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信仰的强化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建构好符合时代的精神大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急迫的重大命题。

记者:为什么人们总体上的感觉是,当下的社会道德低于以往?当下的道德焦虑,为何似乎越来越严重?

公方彬: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打破旧的轮回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有过一个道德高扬的阶段吗?分析起来,当时出现的“道德复兴”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



霾是2013年中国人心中的痛。深藏于社会深处的心灵之霾、道德之霾,同样需要“治理”。 资料图

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也异于西方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吻合,人们被紧紧拴在一块土地、一个工厂或一个社区,不流动的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熟人道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失信直接影响着生存。

改革开放后,道德体系开始出现紊乱,原因在于构成有道德的支撑基础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两大价值系统和两大话语系统乃至思维方式并行的状况彻底改变,其中我们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弱化,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庞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更将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进而将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没有适应这种不紊乱的变化,直接导致价值坐标紊乱。

记者:从是否“被撞”到广场舞地盘之争,“大妈问题”在2013年话题不断。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为什么日益受到强烈的挑战?

公方彬: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发生了多起老人讹诈的事件。但是,哪怕还有更多老人道德失范的个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这就如同尽管罪案比例更高,我们依然不能以个案、群案来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于道德价值体系出现紊乱,人们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体系、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内心的虚无造成行为上的反道德,内心的焦虑需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伦理道德的范式中,一直把老人当成道德的标识和引领者。一旦这一群体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很容易让人们以审丑的心态去炒作放大,并以此作为社会堕落的佐证。

与此同时,审丑的心态已经开始成为这个时代大众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里面呈现的价值观甚至让美国学者都感到难以置信,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连有关郭敬明早年抄袭的异议也被彻底淹没,反而被有的自诩“前卫”的媒体追捧为新一代商业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会都热衷于迎合和满足这种审丑欲望时,原本存在的欺诈和丑恶遭到几何倍数的放大,社会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性中还有美的存在吗?

记者:相对于普通人的这种道德焦虑,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师”的持续发酵,让我们看到像马云、赵薇这样的成功者,似乎同样在热衷寻找“神秘力量”。在所谓的上流圈子里,这种心态和举止已经成为很流行的现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实并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区别。能否找到精神归宿,不决定于社会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养,这是一个无限的运动,有始无终。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权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会发生蜕变。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一些成功人物热衷追寻某种“神秘力量”,恰恰说明社会主流或主导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层面看问题,我们党同样也面临着信仰危机的挑战。过去,革命阶段有牺牲,而牺牲带来神圣感,进而形成和强化信仰。当下,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信仰的强化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建构好符合时代的精神大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急迫的重大命题。

记者:为什么人们总体上的感觉是,当下的社会道德低于以往?当下的道德焦虑,为何似乎越来越严重?

公方彬: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打破旧的轮回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有过一个道德高扬的阶段吗?分析起来,当时出现的“道德复兴”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

守住道德的底线

法官嫖娼与记者受贿

12月,有关湖北法官被指开房嫖娼的监控视频在网上流传。湖北省纪委监委公开回应,省高院刑三庭庭长张军与一名外单位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已提请免去其庭长职务,停止工作,并将依纪依法作出进一步处理。

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

社会裁判者与监督者的职责操守,从来都是决定社会公平的关键要素。一旦这些从业者的操守出现沦陷,道德底线全面崩溃的危险便如影相随。

记者:过去,说起职业道德的败坏,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伪劣产品和食品安全。如今,无论是作为社会法律执行者的法官,还是作为社会良知守望者的媒体人,接连出现侵蚀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恶性事件,您对此又如何解读?

公方彬: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确实区分出一些成为社会标杆和引领者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和法官。一旦这种被赋予了各种神圣光环的群体中出现道德堕落,人们就会怀疑以致失望。

选择这样一些被公认为高尚的职业,就必然要承担职业本身的要求,就要承担职业的责任,这是规则。然而,这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似乎变成一个大问题。还是那句古话,倾巢之下无完卵。

国外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勤劳,同时也最不敬业。两者之间看似有点矛盾,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勤劳务以是一种价值观,也可能是生活所迫。勤劳务在没有职业分工之前就产生了,因为人要糊口。直到工业经济发展后,才有了职业的分工。这时,职业是饭碗,敬业才是价值观。一旦精神世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紊乱,用职业去衡量所谓的道德问题意义不大。

记者:在信任感如此缺乏的当下,一个极端的事件,很容易就让人们产生给一群人贴标签的情况。比如,记者受贿案后,社会对媒体的质疑甚至谩骂;医生收取医药回扣曝光后,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境更为尴尬。问题是,一个一个信任的偶像倒掉之后,我们要去信任什么?

公方彬:从本质上说,为某种职业或人群贴标签,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为老人和青年人贴标签是相同的,都说明我们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系统出现了紊乱。

主观上说,我们不希望社会道德全面溃败。但是,世

界在变化,旧有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环境在变化,相应的道德体系出现紊乱甚至崩塌亦属正常,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的同时,人们更注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思考,从中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非常正常。仓促面对金钱冲

击形成的功利道德,已经到了应该垮掉的时候。

当然,社会道德不能永远这样紊乱下去,需要改善。改善就需要道德个体的人来引领。落到具体方法论上,总需要走在前面的人。比如,执政党要求了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担当。

厘清道德的边界

郭式“打油诗”与北京台封杀

11月,郭德纲微博发出打油诗,“一去残冬晚日红,三杯酒洒冀苍穹。鸡肠曲曲今何在?始信人间报应灵”,同时配了红双喜的图片,被质疑影射刚刚去世的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此前,郭德纲曾与北京电视台交恶。

12月,北京电视台呼吁广大电视从业者坚守媒体

责任,对违背社会公德的恶俗行为予以谴责,对缺乏良知的艺人予以抵制。随后,中广协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

会发出严正声明,强烈谴责郭德纲的过分言行。

如何评价郭德纲的行为,怎么对待具有道德瑕疵的公众人物,其迁出围绕道德边界的纠缠,始终不清。

记者: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再生“过节”。这一次,网络上的声音似乎更多地站在了郭德纲这一边。暂且不论北京台是否封杀,或有无权利封杀,对存在瑕疵甚至重大瑕疵的公众人物的这种民间“宽容”,您怎么看?

公方彬:这里面有一个怎么看待封杀的问题。封杀的前提是有没有违背道德。如果确实存在在无德事实,主流媒体和官方组织是有责任去抑制甚至封杀违背公序良俗的人和事物的。无论后面的“粉丝”有多少,网络上有多少人支持,这个工作都要去做,否则就是失职。

主流媒体承担引导社会的责任,首先需要区分社会价值观的5个层次——弘扬的、要求的、允许的、抑制的和取缔的。一旦反道德的东西出来了,当然要抑制甚至取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出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政府的态度,不能迎合。既然是主流价值,该坚守的就要去坚守。我们必须建构一整套价值体系、评价系统,及其惩治规则和措施。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体都有所遵循。

当然,人们一听到“封杀”这个词就反感,其中有反权威心作祟。主流社会也需要反思,要寻找新的有效办法。毕竟,在当下这个多元社会,复制过去的做法,已不再有力,也不合时宜。

记者:我们发现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偶像”走下“神坛”,包括偶像自己也在自我解嘲,甚至个别对自身的道德瑕疵毫不讳言。这种公众人物对道德感的毫不在意,可能给社会道德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公方彬:公众人物当然应该有所担当。但是,文本明星不是社会道德价值系统的创建者,甚至不是主要承担和建设者。

我们必须分清,哪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哪些人是在为大众提供生活乐趣。前者或以自己的责任和担当,甚至以牺牲创造一个个精神的高峰,或以思想和文明创造启迪世人,后者只是以自己的某些技能参与社会,丰富生活。对前者可以给予很高的期待,对于后者可以给他们提供快乐一样,一笑了之,无须过多地高

调。记者:在信任感如此缺乏的当下,一个极端的事件,很容易就让人们产生给一群人贴标签的情况。比如,记者受贿案后,社会对媒体的质疑甚至谩骂;医生收取医药回扣曝光后,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境更为尴尬。问题是,一个一个信任的偶像倒掉之后,我们要去信任什么?

公方彬:从本质上说,为某种职业或人群贴标签,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为老人和青年人贴标签是相同的,都说明

都能够治愈。一旦腐败进入了观念层面,进入了大众无意识,这时就出现了质变。

中国是人情社会,想想看,现实社会不乏这样三种人——行贿者、受贿者和容忍行贿受贿者。一个贪官没有被抓之前,身边的人怎么评价他?大众怎么评价他?是不是只有在被抓了之后,由媒体、政府、法律给他贴上了标签之后,才开始谴责,才知道了什么是丑?

如果每个人的心内没有对道德的完整理解,更没有化作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腐败的温床注定形成。有了腐败文化的支撑,贪官永远抓不完。所以,在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要花大力气改善文化,甚至是重建文化。否则,类似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奔监狱的事件,就会一再重演。

记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通过典型来体现,那些在职业领域表现出更高职业精神的人们,成为一代人的楷模,引领着一代人的价值坐标。但是在道德领域,善行的政治化倾向,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

公方彬:热情的服务员,不造“豆腐渣”工程的项目经理,拒贿的廉政干部……这些“事迹”是职业本身要求应该做的,不过是道德理念而已。把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求的内容盲目升华,从小处讲是一种媚俗行为,从大处讲就是道德问题非道德化,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民众的心理,扭曲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走向。

存在于普通民众中的善行,本来属于人性的光辉。如果总是赋予太多的政治意义,反而容易弱化人们的天性冲动。毕竟,更多的人还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推动自己的善行。所以,民间自发的赞美和崇敬更为可贵,政府只需要为善行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就可以了。一句话,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好事,而天天在做好事时,就是道德的成熟。

重新建立道德共识

党风建设与机制健全

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实施。

2013年,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更多发展的难题和瓶颈。身份缺失的困境,没有财政投入的尴尬,全民参与者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

毫无疑问,中央正在致力打造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只有让挥霍者收回私享公共利益奶酪的手,同时为贫弱者打造公平拥有社会福利的通途,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最大公约数”,重新建立起道德的共识。

记者:以八项规定和反四风为标志,党风政风已经发生了明显好转。不过,同时也有人担心,这是否是一阵风式的“运动”?道德向好的变化,可操作的执行路径又在哪里?

公方彬:现在做的事不会反弹,历史进程也不能允许反弹了。反弹就会带来社会渐变还是剧变的问题,使得政治权力碎片化,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执政党来说,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怎么解决看似麻乱的精神领域问题、信仰问题,就需要扎实思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

任何失去制度约束的道德随时都会变异,人们都必须借助制度强化道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当我们的制度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强化,公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个道德充分张扬的时代才会来临。

记者:道德领域看似是个民间话题,您又如何看待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公方彬:道德是功利化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是为道德向好提供空间和保障,具体的事情则让民间组织去做,让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去实现。

中央一再提出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政府管该管的,放掉不该管的。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政府不可能依靠权力满足所有需求。这样的背景下,试图以一元(政府)替代多元(需求),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并且无法以物质利益去解读。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又一次深度改革。历史上,每一次改革、变革,都带来一次思想、道德领域的变化。转型期的中国,道德价值体系将扮演着怎么的角色?

公方彬:道德价值体系反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组成人类世界的三种力量分别是政治、法律和道德。这三者各归其位,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当下的问题所在。没有了法律的刚性,其他因素都靠不住。